

从“两会”看中国丛书

CHINA

中国国情报告

体验『两会』问题中国新语态

连玉明

主编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编著

200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国情报告

2009

体验『两会』问题中国新语态

连玉明 主编

从“两会”看中国丛书

CHINA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情报告 2003——体验“两会”问题中国新语态/连玉明主编.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3.6

(从“两会”看中国丛书)

ISBN 7-80169-419-8

I. 中… II. 连… III. 中国—概况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2422 号

本书所发表的资料、观点、解释和结论属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不代表国家、政府及其附属组织观点, 也不代表学术顾问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和机构的观点。本书编著者不完全保证书中数据和信息准确无误, 并对任何机构和个人引用其中资料和信息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从
『两会』
看中国丛书

中国国情报告
2003

体验『两会』问题中国新语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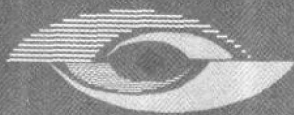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编 著

连玉明 主 编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 24 号青蓝大厦 11 层东办公区
邮 编	100007
电 话	(010) 64066019 (发行部) (010) 64011788 (编辑部)
传 真	(010) 64065971
发行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式设计	北京楠竹文化公司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1.25
字 数	388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书 号	ISBN 7-80169-419-8/F·1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连玉明 著名城市专家，教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国情国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社长。曾任中国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学、学习型社会理论和决策学。长期从事城市竞争力研究，是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和新城市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提出的“城市价值链理论”成为继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提出的“国际竞争力理论”和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之后的新的城市竞争力理论；他研究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和“中国城市竞争力解决方案”被证明为该领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他主持研究的“学习型社会理论”在国内创建学习型社会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执行主编

武建忠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执行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政治学和领导学。长期从事政府政策分析与产业经济研究，在城市跨区域发展和城市中长期计划方面有一定成果，参与制定的一些省的“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省级信息化规划等具有前瞻性，成为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副主编

石龙学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首席评论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情与政策研究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宏观政策与城市战略资讯等方面研究，参与编写的《中国决策白皮书》在经济学界受到广泛好评。

李英才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高级编辑，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县域经济与“三农”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县域经济与县区战略等方面研究，其有关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多县区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赵秀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特约编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学概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特征初探》、《管理哲学》、《欧元解析》等。

编委

丛丽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社区理论研究专家，社区管理体制研究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城市遗产、传播学和社区学。长期从事国际城市文化比较研究与中外社区理论和实践比较研究。

古波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政府管理研究专家，公共安全管理研究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战略、公共管理和学习型组织。长期从事城市化问题、城市发展战略、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刘俊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城市投资与发展环境研究课题负责人。曾任中国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资本市场、企业并购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对城市投资与发展环境评价、经营城市、产业整合模式有深入研究。

辛保林 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副社长，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社区教育、城市运行等方面的研究。

李晓军 中国领导决策信息系统总经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电子政务与政府与公共管理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政府决策、政策分析及公共管理等方面研究。

李瑞香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循环经济与生

态城市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城市环境、生态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金 峰 中国政务信息网首席技术官，网络技术专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政务信息化课题负责人，曾任 IBM、微软网络信息技术专家，对政务信息化及电子政府有系统研究。

张 涛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首席数据分析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数字城市战略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经济数理分析和国情数据统计研究，其以创新数据模型对中国 GDP 增长及区域经济发展比较的研究已成为评价中国国力的重要指标体系，参与编写的《中国数字黄皮书》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好评。

谢杨东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首席观察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宏观政策分析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政府决策、宏观经济动态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是国内较早（2001 年 11 月）撰文提出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的倡导者之一，参与编写的《中国领导红皮书》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

编 著 者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Urban Development, Beijing）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国首家从事城市发展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非营利组织，是中国城市竞争力和世界城市竞争力研究与评价的专业机构。

IUD 以国际城市为标杆，以提升城市价值和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围绕城市发展和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开展城市决策与预测研究，建立全球化学习网络，实施城市战略设计和行动计划，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 21 世纪中国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决策咨询体系。

IUD 的市场定位为城市。服务对象为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或城市决策者提供具有市场前景的战略行动计划和具有市场导向的城市竞争力解决方案；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城市提供经营环境评价和行动指南，推进中国城市国际商务计划和全球化进程；为中国城市与国际组织交流和合作创造条件和便利。

IUD 的目标是做服务全球的中国城市专家。IUD 汇聚着国内外一流的经济学家、科学家和战略家，更吸引大批深孚众望的社会活动家和颇具潜质的政府官员加入其中。IUD “以市场为目标，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所建立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和“中国城市竞争力解决方案”被证明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IUD 网址：www.iud.org.cn）

合 作 者



《领导决策信息》(IDM - Information for Deciders Magazine)是一份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的信息周刊。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编辑出版。1994年创刊以来,以其“权威性、超前性、指导性,独家独特独到;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可信可用可存”的特色和风格,深受党政界、知识界、企业界的支持和认可。主要栏目有“国策要论”、“时事政策动向”、“新理论新观点新问题”、“中国城市报道”、“县域经济”和“数据资料信息”等。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的宗旨是做中国首席政务信息服务商。

中国政务信息网(<http://www.ccgov.org.cn>)是一家专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政务信息的专业网站,是中国政府信息化的战略伙伴。中国政务信息网依托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的独家资源,汇聚时政大事、传媒观察、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领导讲话、专家观点以及城市、县域、数据、专题等信息,并以专业化的信息集成优势和卓越的网络技术优势,为中国政务活动、领导决策和理论研究提供信息支持和咨询服务。该网推出的中国公共信息定制服务,是国内首创的信息服务新型模式,在业界享有较高知名度。

中国领导决策信息系统(<http://www.ccgov.org.cn>)是一个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提供“评价、交流、服务”的信息价值链体系和专业服务公共平台。它以整合 IUD-IDM 资源为基础,以专家顾问委员会为支持,以

领导俱乐部为工作载体，以遍及全国大中城市的地方工作站为服务网络，充分利用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的信息、网络、专家、管道和客户资源五大优势，为党政决策提供依据，为领导交流提供机会，为政企对话提供管道，为组织学习提供支持。该系统正在实施并推广的创建“学习型城市”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

代序

观察中国走向未来的 三个着眼点

今后的 20 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关系着能不能把握和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的战略全局和战略机遇，关系着 21 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以及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走向。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机遇。从战略上看，机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握最有利的时机；二是抓住最有利的机会。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从 1978 年开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解放人的劳动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实现了个人转型；第二次从 1992 年开始，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实现了企业转型；第三次从 2001 年开始，以中国加入 WTO 为标志，以构建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为核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进入了城市转型期。这次转型将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对接为主要途径，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为主体，全面实现社会结构转型。这次转型标志着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以及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把这三个新阶段叫做最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WTO 加速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破坏了旧的秩序，也带来了新的竞争。

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其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社会结构变得脆弱，社会结构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全球化正在淹没城市的市场界限，城市作为竞争主体登上国际舞台，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城市集聚，城市正面临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双重考验。这种考验也许正蕴藏着上述所说的最有利机会。

必须指出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总体上看，不是机遇大于挑战，而是挑战先于机遇。赢得机遇的前提，是必须先经受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改革风险。选择何种改革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改革风险的承载力；二是制度成本。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这种制度变迁在提供一个特别的机会的同时，也必将付出昂贵的成本；三是信用危机，或者说道德危机。机遇往往是制度环境与改革行为博弈的结果。而信用则是牺牲短期利益换取长远利益。二者的失衡便是危机。无论如何，上述挑战都是现实的、刚性的、有风险的。经不住挑战，就根本没有机遇可言。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重点是什么。实现全面小康，根本上是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先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这个载体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不是农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这是中国最现实的国情。2002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7.7%。也就是说中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在未来20年内，如果按照城市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计算，也会每年有大约1300万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至8~9亿多。这意味着除小城镇解决2~3亿人外，中国还必须有200个能容纳3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或300个能容纳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如果不能从战略上加快推进新的城市运动，解决上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这么多人涌入城市，必然带来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必将引发“大城市病”。而现有的基础设施，有限的城市功能，传统的管理模式，也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人群。但，这又是一种必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城市化战略是中

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中之重。全面小康要靠城市化来实现。城市现代化必须先行一步。

中国需要一场新城市主义启蒙运动。这种启蒙是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是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转型，是管理城市向治理城市转型。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五种力量将推动中国的“新城市运动”。它具有五个方面的标志：一是新城市战略。这个战略是以“抓大（大城市）带小（小城市）、以城（城市）带乡（农村）”为核心，积极有序地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解决城市面临的“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专”的问题；二是新城市竞争。WTO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竞争，将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大北京三大城市群为龙头，以城市圈和城市带为单元，以企业集群为主体，以产业扩充或产业升级为重点，以国际商务为核心的区域性全球化的竞争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城市实力、城市能力、城市活力、城市潜力和城市魅力成为城市竞争的五大力量，从而推动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三是新城市经营。经营城市的本质是把优秀的资源交给优秀的人去经营，是社会资源市场化的最优配置。经营城市的核心理念是，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市民创造文化。经营城市需要城市运营商；四是新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是城市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治理，是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安全的治理。政府的职能是做好行政、市政、财政、民政四件事，其他的事由市场和社会去做。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弱化政府管制职能，分化市场干预职能，转化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新的治理结构；五是新城市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必须协调发展，民本、民富、民生是新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

新城市运动是全面小康的重要战略，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知识化、服务社会化、管理科学化、生态化、国际化、先进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新城市运动将加速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做出适当的路径选择。这种“适当”是指在最有利的时机，以最有利的方式加快体制转型和改革进程。或者说，在城市化战略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社会结构的重建。这种重建必须以城市化为突破口，彻底打破中国传统的

“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新的城市治理结构。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土地、解放劳动、解放资本、解放管理、解放科技以及解放生态、资源和环境等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为此，不仅要改革制约这些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体制，更要改革制约它们的社会体制，尤其是人口与就业体制、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使其更加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之后，传统的社会体制仍然在维系着这个超稳定结构的“身份社会”。人作为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在传统社会体制的框架下被打上“农民”或“市民”、“城里人”或“乡下人”、“本地人”或“外地人”的烙印，随之而来的是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表象上是收入差距，实质上比收入差距更严重的是城乡差别。收入差距导致的是贫富分化，而城乡差别导致的却是身份歧视。贫富分化使社会失去公平，它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而身份歧视使社会失去平等，它却在维系社会的“超稳定”。而这种“超稳定”的背后是等级的存在、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天差地别的利益分配。平等的人都被“身份”人为地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居民”变成了“外来人口”，以至最起码的“居住权”也被变成了“暂住权”。人全面、自由、个性化的发展被体制所扭曲，作为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也在这种体制下被人为地限制或扼杀了。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缺少一个支柱，或社会力量。这就是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无所不包、无所不干、无所不能的多重角色。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由于缺乏社会组织体系，致使政府分化出的社会职能找不到有效承接物或者适当的权力载体，社会职能在“权力真空”运转中只能重蹈覆辙。必须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不是政府的“一头热”，而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互动，是社会管理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连动体系的均衡发展。政府向社会分化职能需社会组织做媒介，政府向市场分化职能也需社会组织作为中介。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组织分化职能，本质上体现社会主权，反映社会自治和民主的程度，体现“市民社会”的政治成熟。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政府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转变职能的必然结果，依赖于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和推动。如果没有社会体制改革的全方位支持，发展和完善社会组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府、市场、社会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得到了20年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恩惠之后，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政

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事实上，比政治体制改革更迫切、更现实、更具操作性的是社会体制改革，尤其是人口与就业体制、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承接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全面小康战略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

前言



从“两会”看中国

“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重望。”

相信许多的中国人都曾因上面这两句话而动容，并心感震撼。1998年3月，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以他铿锵有力的语言令中国政坛为之一振，他那特有的果敢和刚毅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转眼间，五年后的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出了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温家宝同志以高票当选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同样的场合，同样的身份，同样的令人感动，同样的震撼人心。如今，以朱镕基为总理的前一届政府在人民依依不舍的目光和代表如潮般的掌声中谢幕，但却把他们那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作风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正因如此，温家宝“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重望”的誓词被认为是秉承上届政府一贯作风而更加务实求真的新风格。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一般比较排斥作为领导者的个性风格的张扬，其通过媒体表现出来的公众形象往往平面化、舞台化。但就是从上届政府开始，或者确切地说是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首次设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开始，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开始把他们的个人魅力展现于世人面前，开始

以他们个人的人性化的一面与媒体零距离接触。也正是从那时起，每年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再不像以往那样好像离得人们很远，相反，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通过领导者那生动鲜活的个人魅力的展现，以及通过他们个人的悲喜愤爱的神情，每年的“两会”开始进入百姓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委员的议题更加贴近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政府总理的关心则与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联。也正是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政府机构改革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弱势群体”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尊重农民、关心农民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失业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在每年的三月激起百姓不尽的回响，引发大众深切的关注，也因此，每年的“两会”被称为国是月、国情月。同样，通过“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讨论，我们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分析，对发展脉络、现状和症结有了进一步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就近观察过去一年来中国高层的言论、举措和政策取向，通过认真总结一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我们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认识上的升华，从而更清晰地看到“两会”所描绘出的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两会”看小康中国之国策走向。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并圈定了一个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十六大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它所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落实十六大目标的历史性重任。把落实中央的部署和实践人民的愿望高度统一起来，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转化为实现宏伟蓝图力量的实际行动，全面启动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是“两会”最核心的内容和最重要的任务，也正因如此，在2003年“两会”期间，全面小康建设前所未有地成为代表委员热烈讨论的议题。

全面小康不仅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指标，更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发展体系。它包括经济的发展、民主的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和谐及人们生活的殷实。由此，全面小康社会成为我国社会整体进步的标志性目标。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首先需要应对的可能是诸多长期积累、难度弥深的问题，还会碰到各种意料之外、突如其来的挑战和考验（如目前的“非典”疫情）。对这一点，新一届政府应该说是有所准备的。“两会”结束之际，新任总理温家宝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就不止一次谈到新一届政府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诸如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小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因此，从“两会”看全面小康，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这一奋斗目标之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不经过几代人团结一致、矢志不移的艰苦努力，不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拼搏奋斗，是不足以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的。而历史给我们的时间又很短，从战略上说也就仅只 20 年这样一个机遇期。“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对这个 20 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其中最核心和突出的一点认识，就是各地如何抓住机遇，争取时间，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不动摇。特别是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能否率先和提前实现全面小康，提前实现现代化，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战略的战略重点。同样，率先实现现代化也成为全国“两会”前各地方“两会”的重点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在其“两会”报告中明确提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为稍后的全国“两会”上关于全面小康建设的相关讨论做了思想准备和信心保证。

正是基于对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这种把握，我们有了一个洞察国策走向、领会国策细微深层变化的重要窗口。从“两会”看中国国策走向，亦成为我们这套丛书中《中国国策报告 2003》所试图解读的内容。其中关于全面小康目标的解读，对新一届政府政策思路的比较，对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阐释，都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两会”的精义和要旨。

从“两会”看发展中国之国力强弱。上届政府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很不平凡”一词，是对五年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的由衷感慨。质朴无华但却重如千钧的四个字勾勒了上届政府抵御金融风暴、扶平洪涝灾害、关注弱势群体、深化改革开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一路攀升，中国的 GDP 总量从 1997 年的 7.4 万亿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10.2 万亿元，特别是人均 GDP 一举达到一千美元大关，为我们全面实现小康奠定了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保证。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年均 7.7% 的增长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具备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从而激发出各个方面特别是民间所蕴藏活力、能力和动力的力量源泉。经济是基础，发展是根本，而增强国力是我们所有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 年的“两会”上，推进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推进综合国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成为代表委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关于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到 2020 年要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而在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以过去五年经